

· 文学研究 ·

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 及其文学批评史价值

曾绍皇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明清时期是杜诗未刊评点高度繁盛的时期,涌现了数量繁夥的杜诗手批本。湖北省图书馆藏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就是清代杜诗未刊评本中的典型批本之一。该本以刘濬《杜诗集评》及其所录诸家评点为批评对象,重估刘濬《杜诗集评》的学术价值、指摘杜甫各体诗歌的客观缺陷,针对《杜诗集评》所录诸家评点再抒己见,或称颂赞赏,或非议批驳,或补充完善,具有鲜明的文学批评之批评的主体意识。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这一评本不仅在清代杜诗评本中独树一帜,而且具有不同寻常的文学批评史学价值。

[关键词]吴广霈;《杜诗集评》;杜诗学;文学批评史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6)03-0046-11

清代是继宋代杜诗学兴盛以后再度繁盛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像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等数量繁夥的杜诗注评本,而且也涌现出了刘濬《杜诗集评》、卢坤辑五色评《杜工部集》等专录评点而不及笺注的杜诗汇评本,共同构筑了清代杜诗学的繁盛局面。更为难得的是,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还珍藏了数以百计的名家杜诗未刊评本,这些珍稀的杜诗未刊评本或有明确署名,或为佚名批点,绝大多数是文学批评与书法艺术的完美结合体,学界至今关注较少,具有重要的文献和理论价值。

在这些数量繁夥的杜诗未刊评本中,大部分杜诗未刊评本的内容都是针对杜诗具体文本进行评论和阐释,甚至具有构建批评理论体系的潜在意识,如国图藏方拱乾批《杜诗论文》以“绪”论诗、杭州图书馆藏李以峙批《杜诗详注》以“响”为用字之妙,俞场批杜专注于诗法等等。但另有一些杜诗未刊评本,其评点的对象主要不是针对杜诗文本内容而发,而是针对他人对杜诗内容的评点与笺注进行批评,在整个杜诗评点史上别具一格,具有鲜明的文学批评史学意义。湖北省图书馆藏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即是后一类评本的典型,其批点主要针对刘濬《杜诗集评》诸家评点而作,因而具有异于一般杜诗评点的独特价值。今略述其杜诗学与文学批评史学价值,以就正于方家。

一、刘濬《杜诗集评》与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

清代诗歌评点中,“杜甫、李商隐二家诗歌,似乎特别引起诗家的注意,评点的家数也较一般诗人为多”^①,在杜诗评点本不断繁夥之后,关于杜诗评点的汇评、集评之作便应运而生,清代嘉庆时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清代杜诗未刊评点的文献整理与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3YJC751073);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湖南杜诗学文献辑考与研究”(项目编号:15B14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曾绍皇,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①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刘澹编撰的《杜诗集评》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刘澹辑录《杜诗集评》共十五卷,是清代杜诗集评方面专录评点而不及笺注的重要之作。该本收录杜甫诗歌 1457 首,有嘉庆九年(1804)海宁刘氏藜照堂刻本。从其集评的情况来看,该书仅辑录诸家评语,而“未敢妄参一语”^①,共辑录评点有姓氏可考者十五家。据刘氏自序,其集评是在许灿已经辑录王士禄、王士禛、朱彝尊、李因笃、吴农祥、查慎行等诸家评语的基础上,增列陆嘉淑、钱灿(钱陆灿)、宋萃、潘耒、申涵光、俞瑒、何焯、许昂霄诸家评语,又附载许灿评语,“荟萃一编”,编成《杜诗集评》。除了标明姓氏的诸家外,“无名氏评则以‘或云’别之”^②。刘氏所辑录的评语“几乎都是从他们各自的杜诗评本辑录而来”^③,关于其辑录的情况和功效,孙琴安在《中国评点文学史》中进行了较高的评价:

……刘澹对评点者原来的评语不是引得很长,而是截取其中最能说明杜诗艺术风格的片段或三言二语,有时甚至仅有两三字,附录在杜甫每首诗篇的后面。只有在必要时,才引用上百字的评语。这些评语或评起句,或评尾句,或就意境言,或就风格论,由这些简评再加汇合,的确可把一首杜诗的好处较全面、系统地揭示出来。这些评语不但目光尖锐,深中要处,而且精炼有力,富有文采,堪称清代杜诗评点中的精品和杰作。^④

由此段评述可见孙琴安对刘澹《杜诗集评》的推崇和肯定。固然,刘澹《杜诗集评》所体现出来的辑选标准是刘澹文学批评观念的真实反映,尤其是其辑存文献之功,实乃功不可没。但是,对于刘澹所辑录的诸家论杜之语,则不一定被后世学者全部认同。有不少学者存有不同意见,如吴广需批点《杜诗集评》中就对《杜诗集评》及其所录诸家评点提出了颇多异议。

吴广需(1855—1919)^⑤,字瀚寿、翰涛、剑华,号剑华道人,安徽泾县人。江苏候补道。著有《劫后吟》。金天翻《吴广需传》记载其生平事迹称:

吴广需字翰涛,自号剑华道人,泾县人也。光绪乙未,王师既败绩于辽东,含垢忍辱,结马关之约,薄海痛心。广需亦慷慨流涕,闭户撰万言书,陈自强策。熟[热]血梗胸,书未成而病。病已,作辍者数,及成而有母之丧,不果上。其书分安内、驭外、筹财、经武、用人、变法都六纲,纲各附以十目,大半皆当时所宜施行者。广需虽布衣,好谈富强术,屡代人疏防海军略,及筹策山西铁路、煤矿、屯田、练兵事。其论域中今日兵争之害,尤蔼然仁者言。……^⑥

金天翻《吴广需传》概述了吴广需“虽布衣”,却心系国事时局,见“王师败绩”,“结马关之约”,“慷慨流涕,闭户撰万言书,陈自强策”,充分体现了他热心国事、关注时局的经世精神。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七十九亦录有其诗《投赠王湘绮先生》二首^⑦。王闿运为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吴广需年龄小王闿运 20 多岁。从他向王闿运所写“投赠”诗来看,似有希望王闿运援引之意。

吴广需为近代评点大家之一。除了批点《杜诗集评》之外,他还批点过《说文解字》两种(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两种(郑州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战国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多种古籍,现分藏国内外图书馆,均未刻印出版,亦未见有人整理。吴广需批点《杜诗集评》十五卷,共一函六册,藏湖北省图书馆。该批本为深黄色封

①(清)刘澹撰《杜诗集评·例言》,清嘉庆九年(1804)刻本,台北:大通书局印行“杜诗丛刊”本。

②(清)刘澹:《杜诗集评·例言》。

③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第 305 页。

④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第 305—306 页。

⑤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09 页。

⑥钱仲联编著:《广清碑传集》卷十八《陈澹然吴广需传》,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233—1234 页。

⑦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收录吴广需《投赠王湘绮先生》二首。其一为:“到处青山好杖藜,沧洲小住即关西。非因赋鵬思辞楚,宁感蜚鸿佐霸齐。风息神鹏图海运,春归杜宇背花啼。愿从五斗乡间醉,付与龙门传滑稽。”其二为:“海角欢迎李郭舟,同袍何地咏同仇。大言自昔轻刘季,好勇奚妨哂仲由。偶聚者英闻凤吹,敢贪富贵羨羊头。吴儿拟作《无家别》,一剑题名天地留。”

皮,首册封面墨笔题“杜诗集评,凡六册”。在《杜诗集评》卷之一下墨笔题“古安吴剑华道人吴广需加批”,《杜诗集评》卷之七处墨笔旁批“古吴剑华吴广需加批”等,明确指出该书乃吴广需批点,并在题识下面加钤“吴广需印”、“剑华”、“剑叟”等印鉴多枚,再次印证该书系吴广需批点的事实。吴广需批点《杜诗集评》一书书长 24.3cm,宽 15.2cm,版框左右双线(外粗内细),半页高 17.1cm,宽 13.2cm,10 行行 20 字,白口,单黑鱼尾,版心上镌书名、中镌卷次、下镌页码。天头宽 5.8cm,地脚宽 1.9cm,为海宁黎照堂藏版。该书扉页题“两浙阮大中丞鉴之杜诗集评海宁黎照堂藏版”,前有清代学者阮元序(嘉庆七年夏五月)、陈鸿寿序(嘉庆八年闰二月)、查初揆序(嘉庆九年六月既望日)、郭麐序、钱沃臣序(嘉庆八年)、刘澹自序(嘉庆九年七月),同时录有王士禄、王士正、钱陆灿、朱彝尊、李因笃、潘耒、查慎行、何焯、宋荦、陆嘉淑、申涵光、俞瑒、吴农祥、许昂、许灿等评点家姓氏,以及例言、《旧唐书》文苑本传、《新唐书》本传等相关内容。

吴广需喜好杜诗,且乐于批杜,其在第二册《杜诗集评》卷一处有墨笔题写五律一首:

夜窗校读《工部集》,敬题一律以识神往;舞句解吟咏,神驰工部诗。古人留妙笔,夜我振才思。遗冢从何吊,心香幸未迟。一编常在手,风雨夜澄知。剑华吴广需敬题。

此题识清楚交待,吴广需“夜窗校读”杜诗之时,“敬题一律以识神往”,流露出对杜诗的尊崇。而从他所作五律诗来看,其津津于批杜之情亦溢于言表。“舞句解吟咏,神驰工部诗”、“古人留妙笔,夜我振才思”、“一编常在手,风雨夜澄知”,句句表达了对杜诗的神往和推崇。

吴广需批点《杜诗集评》乃是中年之事。据《杜诗集评》卷之一处题识“戊申新正人日剑叟书”,考吴广需的生卒年(1855-1919)可知,他批点《杜诗集评》的时间在 1908 年正月初七,此时他 53 岁,正值中年饱学之时,又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故其对杜诗的理解应有更为深切的体验。批本主要有朱、墨二色,以墨笔批点为主。后面三册有少量朱笔批点。批点形式有眉批、旁批、尾批等各种形式,字体以行草为主。该本钤印较夥,在书册的不同位置共钤有“吴广需印”白文方印、“剑华”朱文方印、“剑华”白文长方形印、“剑叟”朱文方印、“剑华道人”朱文方印、“剑华藏书印章”白文方印、“湖北省图书馆所藏善本”朱文方印等印章多枚。从钤印看,该本的流传较为简单,自吴广需批点之后,就被湖北省图书馆所珍藏。

二、吴广需对《杜诗集评》的定位及其对各体杜诗的非议

集注集评是杜诗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杜诗集注集评之作的繁盛,也逐渐形成了杜诗学史一种重要的评注现象。洪业在探讨杜诗集注产生的原因时称:“夫《杜诗》只是一书,乃有注释散在多家,检阅不便,而求集注,乃自然之势也。”^①虽然洪业主要谈论集注,但于集评,道理亦是相同的。由于杜诗单种评注的不断增多、出版技术(尤其是套印技术)的不断更新,明清时期,杜诗集评集注之作不断涌现。如江浩然《杜诗集说》、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许宝善《杜诗注释》、张甄陶《杜诗详注集成》、强溱《杜诗集评》、马桐芳《杜诗集评》等,甚至还出现了众多专录评点而不及笺注的杜诗集评之作,如刘澹《杜诗集评》、卢坤辑五色评《杜工部集》等作。如果纯从集评的角度来看,周采泉在《杜集书录》中对清代杜诗集评之作有过一个评价:“清代之集评,以张甄陶、强溱、马桐芳、卢坤,较为著名,目前通行本仅刘、卢两家,但卢不如刘,盖刘氏以查初白(慎行)及许嵩菴(昂霄)批为底本,有所承袭也。”^②强溱之《杜诗集评》与马桐芳之《杜诗集评》,皆已佚不存;张甄陶《杜诗详注集成》多系仇注本增删而成,价值有限。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杜诗集评之作,我们不难发现刘澹《杜诗集评》在杜诗学史上值得肯定的价值。

^①洪业:《杜诗引得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9 页。

^②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 598 页。

1. 吴广霁对刘濬《杜诗集评》的价值重估

刘濬《杜诗集评》编撰出版后,学界对其功绩亦是多有肯定。阮元评价刘濬《杜诗集评》曰:“罗列诸先辈评语凡若干家,不参己见,可谓善述而不徒作。读杜者其视为五侯之鲭,可乎?”^①看到了刘濬“善述不徒作”的编撰原则,肯定了《杜诗集评》荟萃诸家评点、可视为“五侯之鲭”的资料价值。陈鸿寿则认为:“杜诗浑涵汪洋,千汇万状,得此(注:指刘濬《杜诗集评》)庶足以导示源流,寻求奥窔,不可继蔡梦弼《千家注》卓然成一家言乎?”^②肯定刘濬《杜诗集评》可成一家之言的杜诗学价值。钱沃臣认为刘濬《杜诗集评》“补前人所未道于理,体多所发明,读之豁人心目,开人识见”,“大有功于诗教矣”^③。当然,这些评论,多出自为《杜诗集评》作序者,固然含有溢美的成分,但客观来说,刘濬《杜诗集评》在保持杜诗评点文献、丰富杜诗批评史料方面,还是颇具价值的。

具体说来,刘濬《杜诗集评》的价值大体有三:一是辑录了大量杜诗批评文献。刘濬《杜诗集评》保存了有清一代王士禄、王士禛、钱灿、朱彝尊、李因笃、潘耒、查慎行、何焯、宋荦、陆嘉淑、申涵光、许昂霄等十五家杜诗评点的内容,有助于我们管窥清代杜诗批点之冰山一角。尤其是其中所录申涵光、许昂霄等评点,虽刘濬称其“既已刊行”,但原批均已亡佚,现在所见大多为过录之本,故刘濬集评他们批点之内容亦显得颇足珍贵。二是选录原则上强调杜诗未刊批点的著录。刘濬在《杜诗集评》“凡例”中着重强调“凡刊本皆不载”,除了少数“有精要语不能割爱”的,“仍著于编”外,特别注重对杜诗未刊批点的辑录,体现出刘濬在选录杜诗批点时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有意辑存稀见史料的历史责任感。三是选录内容上仅录富于文学批评价值的批语,而不涉及杜诗笺注内容。这就使得刘濬《杜诗集评》所录批语显得较为精纯,不芜杂,与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等其他清代杜诗著作将笺注、批点融于一炉的体例不同,体现出作者强烈的文学批评意识。另外,专录评点而不及笺注的方式,也有效避免了因集评所带来的文本繁冗之弊,有利于书籍的刊刻和读者的阅读。

但是,吴广霁手批刘濬《杜诗集评》时,对其批点所用之底本——《杜诗集评》却评价不高。在《杜诗集评》卷之一前有“戊申新正人日剑叟书”题跋一则,表达了自己对《杜诗集评》的态度和总体观点:

此本刊者实无聊赖,然以之作剑叟批读本,省令抄胥费手,亦一快也。戊申新正人日剑叟书。在简短的批语中,吴广霁将刘濬《杜诗集评》仅仅定位于“省令抄胥费手”的基础层面,而总评此书刊者“实无聊赖”,可见其评价之低。当然,其之所以如此贬毁刘濬《杜诗集评》之功效,或许是为了提高自己批点杜诗的价值,或许《杜诗集评》中所录诸家评点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不过,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说,认为该书“实无聊赖”,均是过激或不当之评。因此,《杜诗集评》的学术价值在吴广霁心中打上了极大的问号,加之其在批点中对该书所辑录之诸家评语多有非议,这也就形成了吴广霁对该书价值认定偏低的总体评价。当然,吴广霁对《杜诗集评》诸家评点的非议,正体现了他有别于其他杜诗评点的独特之处,不乏真知灼见,有效地丰富了杜诗批评之批评的理论,具有深远的文学批评史学价值,下文将详述之。

2. 吴广霁对杜甫各体诗歌的指摘非议

杜甫各体诗歌兼善,一直被诗评家视为“集大成”。元稹为杜甫所撰墓系铭中早就明确指出:“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④应该说,杜甫五古、七古、律诗等各体诗歌方面都达到了非常

①(清)刘濬:《杜诗集评》,第1页。

②(清)刘濬:《杜诗集评》,第5页。

③(清)刘濬:《杜诗集评》,第18-19页。

④(唐)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4页。

高的艺术水准。但是,杜甫各体诗歌是否就无可挑剔?吴广霁在批点《杜诗集评》时,就利用《杜诗集评》分体编排的特征,对杜甫五古、五律七律、绝句等各体诗歌进行了一些批评和指摘。

五言古诗是杜甫的重要体裁之一。湖北省图藏吴广霁批点《杜诗集评》之卷之三和卷之五处的题识就对杜甫五古提出了非议:

工部五古最擅长,然微嫌贪多,不肯割爱,故不免稍有费词累句,似此乱头粗服者,大家自不妨尔尔,后贤学之者,则不可不知其弊而切戒之也。否则佳处未能神肖,业已疵累满纸矣。
(第二册末页卷之三终处旁批题识)

工部五古短篇犹时有齐梁六朝余韵,鸿篇巨制则多杰作,自出手眼,前无古人,间亦有琐碎艰涩不可诵者,若七古则脱尽恒蹊,目空今古,“提笔四顾天地窄”,“语不惊人死不休”矣。故吾于杜诗七言,尤辨香永佩云。(第三册《杜诗集评》卷之五处眉批题识)

老杜七律,格调高寒,音律入细,多可谱之管弦。唯其中率意酬酢之作,亦不能免。若汰去十分之三,便可首首歌诵矣。(第五册《杜诗集评》卷之十一终处墨笔题识)

他认为,杜甫虽最擅长五言古诗,但亦存在“微嫌贪多,不肯割爱”、“费词累句”,“间亦有琐碎艰涩不可诵”的客观缺陷,诚为的评。因此谆谆告诫后学者“不可不知其弊而切戒之”。五言古诗号称杜甫最为擅长的诗体,也存在可以指摘的地方,这正是他更倾心于杜诗七言的主要原因。

近体诗是杜甫涉猎较多的诗体,也是杜甫成就最高的诗体之一。尤其是杜甫五七言律诗,虽已达到了声律皆备的高度,但尚有可供指瑕之处。吴广霁批点《杜诗集评》的几则题识中就颇有对杜甫五律、七律的微词:

杜诗五律精整合法者居多,惟应酬遣兴之率笔,亦时有不免,倘芟其三四则,皆可歌咏矣。

(第四册末页杜诗集评卷之九终处墨笔题识)

吴广霁针对杜甫律诗中“应酬遣兴之率笔”、“率意酬酢之作”颇有微词,认为只有删去其中部分诗歌,“芟其三四则”或“汰去十分之三”,才“皆可歌咏”,才“可首首歌颂”。应该说,吴广霁对于杜甫律诗缺陷的把握还是独具慧眼,至少可备一说。有时,更是联系李白古体诗歌的创作来比较分析,如对于李白古诗多而五七律诗少的情况,他也将其和杜诗作了较为客观的对比:

李诗古多而五七律独少,因李之天才超逸,不耐低徊宛转,而老杜则情深心苦,悱恻缠绵,此根于性格不同,故摘藻属辞有异,究之,均为大家,不可以随俗见而妄分轩轻也。(第五册《杜诗集评》卷之十一终处墨旁题识)

他从李杜二人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二人诗歌体裁运用之不同,乃在于二人“性格不同,故摘藻属辞有异”,李白“天才超逸,不耐低徊宛转”;杜甫则“情深心苦,悱恻缠绵”,故而造成李白诗歌古多而律少的现实。吴广霁也并未因此有所褒贬,而是李杜并尊,称二人“均为大家,不可以随俗见而妄分轩轻”,亦足为一家之说。

绝句是杜甫最不擅长之作品。故批点者对其多有指摘。即使是肯定之评论,也带上了批评的尾巴。吴广霁在批点《杜诗集评》中则更是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杜甫绝句,他认为:“杜老七绝绝少可诵之作,是其所短,故所传亦不多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杜甫绝句之不足。

三、吴广霁对《杜诗集评》所录诸家评点的称颂、批驳与完善

吴广霁手批《杜诗集评》中,其批评的主要对象并不是杜甫诗歌艺术高下、刘濬《杜诗集评》的价值认定等,而是针对刘濬《杜诗集评》所辑录的诸家评点的批评,这是他批点《杜诗集评》中内容最多、最富于价值的部分。吴广霁对《杜诗集评》所录诸家评点的内容或赞赏,或批评,或辨析,具有鲜明的批评主体意识。概言之,其针对《杜诗集评》所录评点的批语类型大体有三:

1. 以“××批得之”为固定批评形式的肯定型批语。吴广霁在批评《杜诗集评》中所引录诸家

评语之时,往往对其中肯的评语直接加以肯定。这类批语较为简单,且多以“××批得之”的固定批评形式加以立场鲜明的赞赏。如对于《洗兵马》一诗中所引李因笃之评论:“此篇颇存初唐之法,然亦未为杜之绝调,诸家毁誉皆过。”吴广霁即以“李批得之”四字加以批点;另如《忆昔二首》之“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一首,刘濬所引吴农祥之评语:“沉着顿挫,实胜首篇,然首篇胡震亨诋为伪作,亦非也。”吴广霁虽认同吴农祥之评论,却亦仅以“吴批得之”四字批点之。

又如,在《杜诗集评》中,刘濬对于《夔府书怀四十韵》一诗的集评中引录了李因笃评语5则,其中夹批4条,尾批1条,面对大量引述的李评,吴广霁在肯定李因笃的详尽剖析时也仅以“李批尽得之矣”一语概括之,未对其如何评论得当发表任何具体的意见。又如《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七首》一诗中,刘濬共引录李因笃、吴农祥等人批语13条,吴广霁亦是尽为赞赏之,称:“数批各得其妙,唯此诗一片神行,浑化无迹可寻,虽仙才如太白,见此亦当气沮,况常人哉?”高度肯定诸家之论恰到好处,各得其妙的同时,还对其妙处略作申诉,体现出了很好的批评意识。此评语与李因笃尾批:“妙在悠然不尽。○一片空灵,无复声色臭味之可寻矣。然非其人不知。”以及吴农祥尾批“七歌血腥,注射声息,都非不可以句摘,不可以章裂也。”如出一辙,强调其气韵雄浑,浑化无迹之妙。

吴广霁在高度肯定诸家评点之时,往往又能针对同一诗歌的不同诸家评论加以区别对待,品骥高下,鉴别优劣,体现出良好的批评意识。关于杜甫《秋风二首》之“秋风渐渐吹我衣,东流之外西日微”一首,李因笃和吴农祥两人都对其进行了评点。李因笃批曰:“调自高”;吴农祥批称:“似一笔随兴而成,却百思不能到也。此谓神动天地”。关于此两人的批点,吴广霁没有提出异议,但对两人的批点内容作了肯定程度绝然不同的评价:“李批未能深入,吴批得之”。既称赞了二人评点,又对李因笃批点过于简略,“未能深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而高度肯定吴农祥之批。而从李因笃、吴农祥二人评点的具体内容看,吴广霁之评切中肯綮,可谓善于对批评进行批评了。

对他人评点作具体剖析最典型的是吴广霁对于《杜诗集评》中《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一诗的再批评。在《杜诗集评》中,刘濬共引录有朱鹤龄、李因笃、吴农祥、王士禛等人批语多条,在这些人的众多批评中,吴广霁独欣赏王士禛对该诗的批评:

王云:《八哀诗》本非集中高作,世多称之,不敢议者,皆揣骨听声者耳。其中累句须痛刊之方善。石林叶氏之言,其识胜崔德符多矣。余《居易录》中详之。○《八哀诗》最冗杂不成章,亦多吮呿语,而古今称之,不可解也。

对于王士禛的这则评语,吴广霁称:“王批允为笃论”,高度肯定了王士禛对此诗“最冗杂不成章,亦多吮呿语”、“累句须痛刊”之批评。其实,王士禛之论在刘克庄《后村诗话》中所引叶石林之语中已有类似论断^①,他亦在《带经堂诗话》中坦陈:“《后村诗话》先已言之”,其中所论“皆确论,与予意吻合”^②。王士禛认为,之所以造成“世多称之”、“古今称之”的局面,主要缘于“不敢议者,皆揣骨听声者耳。”人云亦云,没有自己对于杜诗的独立见解。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八哀诗》自诞生之日起,便充满了争议。褒之者如崔德符认为《八哀诗》“可以表里《雅》《颂》”、韩子苍认为《八哀诗》:“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方驾”^③、魏庆之认为:“《八哀诗》在古风中最为大笔”^④、郝敬认为:“《八哀

①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称:“杜《八哀诗》,崔德符谓可以表里《雅》《颂》,中古作者莫及。韩子苍谓其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方驾。惟叶石林谓长篇最难,晋魏以前无过十韵,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倾倒为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不敢议其病。盖伤于多,如李邕、苏源明篇中多累句,刮去其半方尽善。余谓崔、韩比此诗于太史公纪传,固不易之语,至于石林之评累句之病,为长篇者不可不知。”(刘克庄:《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4页。

③(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所引。

④(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四引《少陵诗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诗》雄富”^①、李因笃认为《八哀诗》：“叙述八公生平，称而不夸，老笔深情，得司马子长之神”^②、张潘认为《八哀诗》：“随人即事，笔法种种，故是大家”^③、《唐宋诗醇》则谓：“子美《八哀》，自是钜篇”，如此等等，都是高度肯定《八哀诗》的成就。贬之者亦不少，如叶石林认为《八哀诗》：“本非集中高作，……盖伤于多，如李邕、苏源明篇中多累句”^④、唐元竑认为《八哀诗》“累累满纸，摘其佳句，不可多得”^⑤、王士禛认为《八哀诗》：“最冗长不成章，亦多吮呿语”、“钝滞冗长，绝少剪裁”^⑥等等，大多认为《八哀诗》不是杜甫得意之作，且也未能代表杜甫诗歌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多累句，冗长钝滞，缺少剪裁，但是却被后人多加称颂。王士禛之评点也是基于这些点而立论的。总之，“论此诗者，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损其真。”^⑦王士禛的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自然见仁见智。清代学者翁方纲在分析王士禛批评《八哀诗》的原因时称：“其所摘累句，则渔洋于诗，以妙悟超逸为至，与杜之阴阳雪帅、利钝并用者，本不可同日语也。”^⑧翁方纲认为，导致王士禛批评的主要原因在于王士禛与杜甫诗学观念的不同，王士禛倡导神韵说，强调清逸淡远，这或许能部分解释他强烈批评《八哀诗》的原因。因此，学界一般认为：“王士禛论杜《八哀》，不为无见，然亦有失中肯”^⑨。为了辅助说明王士禛此种观点的成立，吴广霁在继后的批评中也阐述了《八哀诗》“拉拉杂杂，纷乘庞集”的缺陷：

（墨尾）《八哀》篇自是煌煌钜制，惟每篇必详载其人一生事实并才能等等，自不免拉拉杂杂，纷乘庞集。且每篇一韵到底，又不换韵，虽广以通叶，仍难免凑趁之病，大家名作，固不必吹瑕索班[斑]也。

（墨尾批集评后）斯为平心笃论，工诃古人者，其集中宁能有此钜制哉？

吴广霁此批，是在王士禛的基础上，进一步指摘《八哀诗》的具体缺陷和不足之处，但是，他在批评《八哀诗》不足之处的同时，认为当以宽阔的胸襟去理解此诗，不必苛责古人。抛出“大家名作，固不必吹瑕索班[斑]”的观点，甚至认为：“工诃古人者，其集中宁能有此钜制哉”，可能一般人还达不到杜甫《八哀诗》的境地，可谓较王士禛专摘其缺陷又多一重客观批评在其中矣。而对于《八哀诗》的毁誉情况，吴农祥在其批点中进行了简略的概括，可以看出吴广霁观点来源于吴农祥批语的蛛丝马迹：

吴云：《八哀诗》，崔德符谓：“其表里雅颂，中古作者莫及。”韩子苍则谓：“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方驾。”二者皆具法眼，至叶石林遂病其太多，累句欲删其半方尽善，而郑继之攻摘尤苛，皆不善读公诗者也。

此处，吴农祥一方面对历史上针对《八哀诗》的评价进行了概括，另一方面对攻摘《八哀诗》过于苛刻的情况进行了批判，认为其“皆不善读公诗者也”。因此，吴农祥“不善读公诗”这一观点与吴广霁提出的要对《八哀诗》进行“平心笃论”的观点异曲同工，可见吴广霁观点的渊源。

2. 非议诸家评点之否定型评语。吴广霁批点《杜诗集评》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肯定、称赏诸家评语，更重要的是借评点杜诗指出诸家所论的不当，表明自己对相关问题的观点。因此，非议诸家评点

①(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郝敬评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20页。

②(清)刘澐：《杜诗集评》卷三，第367页。

③(清)张潘评注：《读书堂杜诗注解》卷十三，台北：大通书局影印本，第1241页。

④(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所引。

⑤(明)唐元竑：《杜诗攷》卷三，台北：大通书局影印旧抄本，第161页。

⑥(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3页。

⑦《唐宋诗醇》卷十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⑧(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六，见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7页。

⑨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卷十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63页。

之否定型评语在吴广需手批《杜诗集评》中占有较大篇幅。

总体而言,吴广需对《杜诗集评》所引录的诸家批语中,对李因笃、吴农祥二人批语的非议最多。从其非议的用语看,吴广需对诸家评语之批评,多直接用“谬”字加以否定。如《石龕》一诗李因笃批评称:“竟似两截诗”,他不同意此观点,复加批点道“此批亦谬”;《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一诗李因笃认为:“结太煞,便索然”,对此,吴广需亦辩驳称:“李批大谬”;《后出塞五首》之“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一诗,许灿认为:“此首途中作,归美主将之严”,而吴广需则不同意此种说法,称:“‘借问’二句有轻视厌薄之意。非归美之词也。许评大谬。”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吴广需好以“谬”字直接非议诸家之评语。

除直接指出诸家评语之“谬”外,有时还对诸家评语的谬误之处加以剖析,让人明白其所批评的理据。如关于《早朝大明宫奉和贾至舍人》一诗,李因笃曾认为“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一联不甚妥当,并将“朝罢”二字批抹掉,称:“摩诘诗用‘朝罢’于第七句则可,公作竟是前半早朝,后半朝罢矣”,针对李因笃的这种批评,吴广需亦提出非议,“早朝诗岂竟不能预计其退朝时事耶?李批缪妄,是以八股之戒犯下律诗歌也。”既不同意李因笃之评论,也指出了其所以不同意的原因在于李因笃之论“以八股之戒犯下律诗歌也”,颇有说服力。故吴广需在该诗题首批曰:“此唐人应制诗之正轨也。浅人不解,或任意批抹,陋哉!寒乞子相乌可与之论盛唐哉?”正是道出了对李因笃等人任意批抹的不屑与非议。陆嘉淑也对后人妄删之举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陆云:七言近体,竟为世人应酬捷径,一事一物,即有八句在其笔端,以其排比声律,易于就范也。然而虚响易工,沉实难至。唐人倡为此体,本为升平之奏,气象高华。少陵身遭丧乱,气亦一往悲壮,曾无衰飒之色,后人不循元始,妄删[删]应制,忽逃禅寂,近复变为柔曼,师乙所云“靡靡之音”也。

陆嘉淑从七言近体的体制角度分析了成为应制诗的客观优势,提出不可妄删的原则,故吴广需剖析此诗总体氛围为“裔丽堂皇,一片承平雅诵声”,看到了该诗深厚的应制气息。

评点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公正客观,既不过于谀颂,也不刻意护短。吴广需在批点《杜诗集评》中,针对刘澂辑录的诸家评语中过分拔高杜诗艺术的情况,也曾提出毫无情面的驳斥。《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一诗,《杜诗集评》中引录有李因笃评语5条,吴农祥批语1条,但多为称颂此诗之评。如李因笃评此诗谓:“极冠冕,极风雅,真大手笔,不负斯题”,称“何必三千徒,始压戎马气”一段处“中有至理,咀之始出,先正谓公见道过昌黎,信然”,无不极尽称颂之意。吴广需对此空洞的称赞颇为不满,认为李因笃之论乃是“盲称瞎赞,那得知诗?”可见其坚持语必有据的批点风格。同样,吴农祥关于此诗亦是高度赞扬,认为该诗“大题目,大作用,句句精警”,对此,他亦觉得吴农祥之论“未必”如此。而考其实际,吴广需批评李、吴二人之称颂评语,显然是出于反对过分拔高杜诗的目的,亦不无道理。

杜诗号称“诗史”,很多诗歌都与当时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紧密相关。因此,揭示诗歌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事件是诸多评点家批评杜诗时的主要任务之一。对诗歌反映史实的不同见解,也是吴广需非议他人批点的对象之一。如对《前出塞九首》组诗到底反映的是唐代哪段史实的问题,不同的批点者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查慎行认为:“《前出塞》为天宝中用兵南蛮而作”,吴广需对于查慎行的解释表示怀疑,称“此未必然。当是哥舒翰征吐蕃时事”,二者因对《前出塞九首》所针对的历史史实不同而产生了非议。关于此条评语孰是孰非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关于《前出塞》和《后出塞》是否为同一时期所作的问题。王嗣奭《杜臆》中称:“《前出塞》云赴交河,《后出塞》云赴蓟门,明是两路出兵。考唐之交河,在伊川西七百里。当是天宝间,哥舒翰征吐蕃时事。诗亦当作于此时,非追作也。”钱谦益在王嗣奭的基础上,根据地名不同而具体阐释了前后《出塞》的不同:“《前出塞》为征秦陇之兵赴交河而作,《后出塞》为征东都之兵赴蓟门而作也。”而胡夏客从诗题命意的角度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前后《出塞》诗题,不言出师而言出塞,师出无名,为国讳也。可为诗家命

题之法。当时初作九首,单名《出塞》,及后来再作五首,故加前后字以别之。旧注见题中前后字,遂疑同时之作,误矣。”可见,吴广霁此种怀疑,当亦符合历史史实。同样也是对于历史史实的记载问题,历来论诗者皆称杜诗为“诗史”,可补正史之缺。因此,很多评点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诗歌中反映的历史史实过度夸大,认为诗歌能详历史事实之本末。如《入衡州》一诗,刘濬在《杜诗集评》中引录有吴农祥评语三则,并称:“崔瓘以贤能见害于臧玠,本末于此诗颇详,故存之”,对于吴农祥的此种评论,吴广霁认为:“此诗实亦未详其见害之本末也”,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评价。钱谦益对此诗中反映的崔瓘被臧玠所杀之事笺注甚详,通过此笺注,方可谓“本末颇详”也。

非议他人评点的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由于诸家艺术标准和价值取向不同所造成的。如关于是否凑句、是否佳妙等涉及主观评判的艺术问题,往往也导致了吴广霁的批评。《新安吏》一诗,李因笃认为该诗在结构方面不够紧凑,故批称该诗:“乐府遗音,遂欲节数语,使之紧凑。”对于此评,吴广霁也发表不同的看法:“此等诗并无凑句,何可节也?”强调该诗没有凑句可节,可见,二人对于同一诗歌的不同评判标准,也是导致其非议的原因,这就没有评判的高下之分了。同样的情况,在《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又一首见王洙本)中也同样存在,吴农祥认为:“此作亦佳,当并存之”,称此诗可以和前一首并存。而吴广霁则认为:“前作甚佳妙,此可删也,并存何为?”指出此作没有存在的意义,其批评的原因亦是艺术取向的不同所致。

3. 不以非议他人观点为目的之补充完善型评语。吴广霁对《杜诗集评》中诸家评点的批评中,也有不少是进一步深化诸家评点内容的批评,其目的不在于批评批点者的观点,而在于补充、完善。如《发同谷县》一诗,吴农祥称该诗:“一气读,一笔写,相见寻常事却说得骇异不同,此人人胸臆所有,人不道耳。”对于吴农祥此评,吴广霁加以补充说明:“非人不道,实人人道不出耳。”吴广霁批语由“人不道”向“人道不出”的转变,更加肯定了杜诗的超妙和难以企及。比吴农祥之评更加有力度,有感情。另如《发同谷县》一诗,吴农祥有一段评论称:

吴云:《发同谷》章法止而复起,有两山连合之势。○以同谷之有佳主人也。故别而泪再滴,先生之于交情,深念旧恩也至矣。近人有以《七歌》中“蝮蛇”喻同谷主人者,吾不信也。

针对吴农祥不信近人“以《七歌》中‘蝮蛇’喻同谷主人”的论断,吴广霁亦加以补充否定:

何至此喻者,过也。“蝮蛇”等语皆比一切乱贼也,胡可以拟同谷主人?作此说者,皆喜乱贼而恨善良者也。

由吴农祥之“不信”的笼统批评,到吴广霁对“蝮蛇”一语具体比喻对象的揭露,甚至点出“作此说者”的真实用心所在,可见吴广霁之补充颇有说服力。

另外,如《前出塞九首》一诗,李因笃认为“九首凡涉议论者皆舍之”,强调舍弃其中的议论之作。而吴农祥对近人单取其中一首为重的做法也发表过评论:

吴云:前后《出塞》,皆自出机杼,非古今常出之语,常用之格。然一篇作一解,九首一章也。五首又一章也。近王凤洲乐府之变乎?乃选者或单取一首以为重,大是不解事者。

○《出塞》、《从军》,唐人作者多矣,至公自开一径。

吴农祥认为这种割裂组诗的做法,“大是不解事者”,针对这样同时出现的不同评点,吴广霁为了能够正确理解杜诗,就着吴农祥的观点加以引申,以简略而明确的批语表明自己的态度:“此等诗当玩全章,决不能单取一二首”,使人能于众说纷纭的批点中找到正确理解杜诗的途径。

可见,吴广霁对《杜诗集评》中诸家评点的批评不一定均是以非议其观点为目的,有时还着意于补充、完善其观点而言。体现出他在批评过程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不以个人好恶为中心的良好批评意识。

吴广霁对诸家批点之批评的意义还表现在,他在批评诸家评点的同时,能够指出其内容来源,为读者提供清晰的杜诗批评发展脉络。如查慎行批点《房兵曹胡马诗》称:

查云:壮心如见,老杜许多马诗,此为最警。前半只说骨相,后半并及性情,何等章法。

针对查慎行的这段批语,吴广需敏锐地看到了查慎行批语的来源,其用简练的语言称“‘前半云’是沈归愚评”,看到了查慎行评语与沈德潜《杜诗偶评》中内容的渊源关系。查沈德潜《杜诗偶评》,沈归愚的评语为:

前半论骨相,后半并及性情,万里横行指房兵曹,不然,句句说马,有何意味?

于此可见,似乎查慎行之批语来源于沈德潜评语无疑。但考查二人的生卒年,沈德潜生于1673年,卒于1769年,查慎行生于1650年,卒于1727年,查慎行比沈德潜早出生23年,且又早去世42年,要查慎行采录沈德潜之评语的可能性极小。且查慎行《初白庵诗评》中未见此条评语,此或为刘潜所见查慎行其他本子的批语。因此,是沈德潜截取查慎行评语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关于《房兵曹胡马诗》一诗,元代赵沍也发表过类似的评语:

前辈言咏物诗戒粘皮着骨。公此诗,前言胡马骨相之异,后言其骝腾无比,而词语矫健豪纵,飞行万里之势,如在目中,所谓索之于骊黄牝牡之外者。区区模写体贴以为咏物者,何足语此?

因此,从赵沍批语可见,查慎行与沈德潜二人之批点内容亦与其批语略有相似之处,或许二人皆受赵沍之评而来,非互相之间借鉴也。不过,吴广需对查慎行评语的批评,尽管其所谓来源与沈德潜评的观点值得商榷,但对于我们搞清楚杜诗评语的来源提供了线索,且多有启发和助益。

四、吴广需手批《杜诗集评》的文学批评史价值及其典范意义

清代数量繁夥的杜诗未刊评本中,绝大多数都是针对杜诗内容的批评,如方拱乾批《杜诗论文》、奚禄诒批《杜诗详注》、钱陆灿批《杜工部集》、陈治批《杜工部集》、商盘批《杜工部集》、吴锡麒批《杜诗偶评》、严复批《杜工部集》、孙承泽批《杜诗胥钞》、方贞观批《杜工部诗集》等等,都是立足于杜诗文本内容而进行的。而吴广需手批《杜诗集评》则主要立足于杜诗批评之批评,几乎没有对杜诗具体内容的评点,这一独特的批评形式,使其成为杜诗学史上独具匠心的杜诗未刊评本之一。这部著作实际上涉及到了有关文学批评之批评的文学批评史学的理论问题,这也正是其在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文学批评史学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存在的以“诗文评”为主要批评、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史的分支学科之一。黄霖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论略》一文中对整个文学批评史学学科的具体内涵和发展流变进行了论纲式梳理:

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在中国的文学界出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概念,明确而自觉地将中国古代的文论著作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逐步建立起了一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时至今日,我们溯流探源,不能不觉得大致从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序》针对班固《离骚序》的批评起,到刘勰对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珣《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等一一作出评判(《文心雕龙·序志》),再到本世纪初刘师培、黄侃等对于《文心雕龙》作专门的研究,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以“诗文评”为主要批评、研究对象的历史过程。^①

黄霖先生从传统目录学对诗文评的著录和提要、传统注释、校勘、辨伪、编辑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对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以及诗话、文话、序跋、杂著、专论、评点等理论性批评著作中涉及的文学批评之批评现象出发,对古代文学批评史学学科体系的具体内涵和研究对象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梳理,为进一步拓展文学批评史研究范畴、深化文学批评研究提出了新目标,开拓了新领域。

^①黄霖编:《文心雕龙汇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论略》(代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从传统目录学角度看,“古代文学批评著作在古代书目集部的分类中从‘总集’—‘总集文史’—‘诗文评’的渐进,标志着人们对于这门学科的逐步认可和认识的深化。它说明了文学批评这门学科尽管与文学创作、历史批评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它毕竟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①因此,当代学者曾将文学批评史学纳入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如蔡镇楚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称:“文学批评史以文学批评为研究对象,是对文学批评作系统的历史的考察。研究范围涉及到‘文学批评的历史’与‘历史上的文学批评’,故其以‘史’为纲,以文学批评为目。主要任务在于通过文学批评史料的调查、考证、分析、比较、综合、归纳,从纵的方面去探讨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全过程及其规律性,并适当从横的方面进行批评家、批评流派、批评理论以及中西文学批评实践的比较研究,以寻求各自之间的异同及各自不同的文化性格。”^②此处,虽然提出了要将“历史上的文学批评”来作为研究对象,但在具体操作中并未能够很好地对文学批评之批评进行较好的梳理,未能完整地梳理文学批评史学的发展脉络。文学批评之批评研究的文学批评史学研究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去发掘文献资料、完善理论体系,以更全面地凸显文学批评史学的学科意识和理论构架。

清代作为杜诗研究高度发展的时期,此阶段出现的杜诗研究著作以朱鹤龄《杜工部诗辑注》、钱谦益《钱注杜诗》、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等杜诗评注之作为主要代表,而集评类的杜诗著作则以刘濬辑《杜诗集评》、卢坤辑五色评《杜工部集》为盛行。针对这些杜诗研究和评点著作,人们的观点并非一致,从而出现了许多针对这些著作观点的批评性评点,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杜诗未刊评点,如上海图书馆藏陈訏批点《杜诗详注》专揭仇兆鳌评杜之讹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李念慈对《钱注杜诗》中钱谦益的笺注毁誉参半的客观评点,南京图书馆藏方贞观对朱鹤龄《杜工部诗辑注》中朱鹤龄注释的评点,湖北省图书馆藏秦应逵对浦起龙《读杜心解》的辩驳等,无不反映出杜诗未刊评点中所涉及到的关于杜诗批评之批评的问题。如果从这个层面来审视吴广霏批点《杜诗集评》的价值,那么此书具有了异于一般杜诗评点的典范意义。因此,对这些散佚的杜诗批评之批评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与研究,将极大地丰富杜诗批评的文献宝库,有助于杜诗研究的深入、细化,甚至为文学批评史学的构建提供难得的稀见资料。

[责任编辑:金城 jdxbjc@163.com]

①黄霖编:《文心雕龙汇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论略》(代前言)),第3页。

②蔡镇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7页。